

何兆武
思想文化随笔

触摸 时代的 灵魂

何兆武谈读书 // 何兆武 著

不了解思想

就无法了解一个历史时代
的灵魂。

 学林出版社

 何兆武
思想文化随笔

触摸时代的灵魂

何兆武谈读书

何兆武 /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触摸时代的灵魂：何兆武谈读书 / 何兆武著 .

--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10

ISBN 978-7-5486-1582-8

I . ①触… II . ①何…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34164 号

策 划 人 钟秀斌 周青丰

责任编辑 许钧伟

特约编辑 夏 青

封面设计 微言视觉 | 苗庆东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

触摸时代的灵魂：何兆武谈读书

何兆武 著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6-1582-8/I·217

定 价 48.00 元

何兆武

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

历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社会契约论》《思想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历史理性的重建》《中西文化交流史论》《西方哲学精神》《苇草集》等，另有口述著作《上学记》。

自 述^{*}

我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9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由南京迁校）；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

毕业后，按时间顺序，我基本的简历如下：1946年至1949年任中国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年至1950年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至1956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6

^{*} 本文原载《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收入本书，编者略有修改。

年至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学术交流方面，1980年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1984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年至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3年至1995年任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研究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和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以及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

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和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噶邦福老师（J.J.Gapanovitch）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侯外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30年。

我认为侯先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定意识，

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 20 世纪 60 年代所风行的观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决定一切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接连不断，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些，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哈布瓦赫（Halbwachs）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种名家的注释本和沃恩（Vaughan）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颉颃：一条是由笛卡尔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帕斯卡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学，帕斯卡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

我恰好有一本布伦茨威格（Brunschvicg）的帕斯卡权威本，所以就译了他的《思想录》，并找了几种注

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我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把它译了出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译了几部书，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文集中。

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 19 世纪、20 世纪的中国还在补西方 18 世纪、19 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就是在思想上补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课。

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违反科学），又有非科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尽历史学之能事）。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还另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

括阶级性在内，但阶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中国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的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目 录

001	五柳读书记
014	读书是一种享受
025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037	我的联大师友
057	纪念梅贻琦校长
067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
076	回忆吴雨僧师片段
091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099	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
106	缅怀向达先生
113	侯外庐先生印象
123	必然与偶然 ——回忆钱宝琮先生的一次谈话

130	怀念王浩
135	师友杂忆五则
154	也谈“清华学派”
168	沉钟亦悠扬
172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180	当代西学翻译与出版的病灶
186	关于柏克《法国革命论》 ——我的一点答复和意见
194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205	编 后

五柳读书记*

◇ 理想和金钱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还难预言，而对历史做任何预言大概都是危险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遍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来抹杀普遍的价值。

◇ 严格地说，绝对的平等、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民主都不存在，百分之百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是大是小？是朝着哪个方向走，能有几分做到，还是根本就是骗人的？我们不能因为理想的不可实现就把它一笔勾销，毕竟还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否则就没有希望了。

* 本文由作者口述，料峭子整理。

我也喜欢读书，但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前些年我回湖南老家，和几个老同学聚会了一次，有个老同学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什么都没有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我以启发，它的讲法值得我去读，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能自得

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有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地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

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一次我在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图书馆（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看到一本书，题为 *The Tragic Sense of Life*（《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乌纳穆诺（Unamuno）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西班牙最古老的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校长，佛朗哥专政时期惨死在法西斯集中营中。他大概是受到堂·吉珂德的影响吧，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唯有王浩认为就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 peace of 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 peace of mind 一定要 through glory 才能得到。”我想，一位老先生，

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 *peace of 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得到 *peace of mind*，否则不会心灵平静。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乌纳穆诺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他实际上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仿佛并没有谜底，乌纳穆诺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变，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

1940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莫罗阿（A. Maurois）的 *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如他把多恩（Donne）的诗句 *I'll undo the world by dying* 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 *violon plaintif* 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作者莫罗阿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斯特雷奇（Strachey）、德国的路德维希（Ludwig）齐名，但我觉得斯特雷奇和路德维希都不如莫罗阿那么灵心善感。《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

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以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莫罗阿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后来我又找到莫罗阿的成名作 *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32岁就早早故去。可是莫罗阿用他一贯的温情，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 *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惊叹道：“莫罗阿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莫罗阿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由于莫罗阿是英国通，所以“一战”“二战”中担任了法国的对英联络员。“二战”结束时他访问美国，在大西洋上看到美国舰队演习的耀武扬威，感叹道：“有这样威武雄壮的海军，真是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后我不禁惋惜道：“莫罗阿已经成了法国的林语堂了！”（在当时人看来，林语堂不过是“骗